

# 基于语料库的 幽默文本 翻译研究

——以钱钟书的汉语小说《围城》的  
英译为个案研究

戈玲玲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基于语料库的 幽默文本 翻译研究

——以钱钟书的汉语小说《围城》的  
英译为个案研究

戈玲玲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于语料库的幽默文本翻译研究：以钱钟书的汉语小说《围城》的英译为个案研究 / 戈玲玲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12 (2015.1 重印)  
ISBN 978-7-5135-5452-7

I. ①基… II. ①戈… III. ①《围城》—英文—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207.425 ②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2096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付分钗  
封面设计 高蕾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九州轩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15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5452-7  
定价 59.9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254520001

# 序

翻译自人类有语言起，便已存在。讲不同语言的人，要沟通，只好借助译员的口头传译或者书面文字转译。以前交通不发达，也没有经济贸易的所谓全球化，译员只是少数人的事，服务的对象也很有限。据说，诸葛亮深入不毛，平定南蛮，就有译员随行；郑和七下西洋，随员兼作翻译。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译员仍是少数人的工作。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经济高速起飞，融入全球化的大潮，今天赫然已居世界之仲。随之而来的，是译事无处不在。贸易、金融、股市、媒体、涉外行政司法海关，等等，几乎每日每时都涉及译员的工作。

对译员的需求多了，自然就有了培训译员的要求。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就是亚洲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有硕士学位课程的翻译系，之后又有学士、博士学位课程。戈玲玲君便是该系毕业的翻译学博士。

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又称翻译研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式兴起的一门独立学科。所谓“兴起”，是指由欧洲学者发起，再达至北美、亚洲、澳洲等地区。所谓“独立”，有两个意思。其一，古今中外，译员们将自己心得体会，或口头，或文字，互相交流，传予同行，惠于社会，本是一项自有了翻译活动就存在的事情。很多时候，从事翻译的人本身就是宗教人士、政府官员、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科学家、作家、诗人，对参与译事的体会自有独到之处。严复译毕《天演论》之后写下的“信、达、雅”，乃一位充满了闪光思想的译者对外文译入中文过程中既实际又透彻的理解。之后，译者和学者们纷纷对之批注阐释，其实

都是徒劳无功。何也？因为译者无非要完成一件实际得不能再实际的工作，将案前的一篇文章通过自己的大脑和双手，写成读者看得懂的译文。译成之后，他或她要发表一点感言，乃再自然不过的抒发。况且，译事有难易之分，难度越大，往往非有造诣修养的文人高士而不逮。日文《源氏物语》若没有丰子恺、林文月这样的才子，恐难与中文读者见面。文人高士对译事的评论与感受，无论何其深透纸背，震撼人心，也还是其人其境的个人感受。本身并不具有系统的理论基础或者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实践程序。课堂上，老师说译文要“信”（或“达”或“雅”）；学生问：何之谓？奚能达？老师拿出几个例子，再讲讲自己的体会，答曰：好了，自己去体会和实践。这就是教翻译最容易、也是最不容易的地方：好像说了什么，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在刚刚进大学的一年级同学与发表高论的文人雅士之间，仍然隔着十万八千里！又过了一年、两年、三年，要毕业了，除了一科又一科地做着老师布置的翻译功课，也还未体会到“信”“达”“雅”的精髓。没有逐渐升级的教材（基础、中级、高级等），没有一篇不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译文。可怜的学生，更可怜的老师！怎样建立起一个关乎翻译过程、翻译作品、以及翻译作品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理论系统，使之可以有原则性的指导译员培训，不再依靠译者抒发感受的只字词组来指导翻译教学，便是使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初衷之一。

其二，传统上，对翻译作品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范畴。在中国，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在中文系教的，属于外国文学学科的大范畴，也包括对这些已经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在中文系，比较文学就是中、外文学的对比研究。唯有两点。一、中文系老师自己基本不做翻译，靠的是外文系老师和社会上的外语人才已经做出的外国文学译本来教书和做研究。二、中文系的比较文学研究不涉及翻译过程本身，因为非通晓外文而不可。这样一来，涉及翻译过程、译文质量的对比研究，就落到外文系身上。于是，

外文系的比较文学常常是拿外国文学作品和它的中文译本进行对比，以及拿中国文学作品和它的外文译本进行对比。这种双向的、基于译文的中、外文学作品的对比研究，在海外的中文系也是大行其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外文系，不依据译文的、一般性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反倒成了次要的任务。

不管是拿外国文学作品和它的中文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还是拿中国文学作品和它的外文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翻译过程、译文质量、译文的社会文化功能。这样，“翻译”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就凸现出来。它并不专指从某一源语到某一译语的转换，更不专指某一篇原文至某一篇译文的逐译，而是从源语转换至译语的普遍意义上的纯理论探讨。但是，文学作品远非翻译作品的全部，文学翻译也不是翻译活动的全部。在比较文学范畴研讨翻译问题，势必有其局限性。它受文学理论大框架的约束，也受地域性特征的约束。近半个世纪，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文化研究，无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烙印。在本质上，比较文学并不关心从源语转换至译语的普遍意义上的纯理论探讨。

古今中外，翻译活动的一个非常实际的用处，就是用以外语教学。你要学一门外语吗？好，教你一些生词，教你一些语法，然后就是反复地来回翻译。翻译得越多，你对要学的语言就越熟悉；翻译的东西越高深，证明你的进步越大。不过，老师和学生都很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此翻译过程之中，两种语言的来回转译，对学生掌握一门原来完全不熟悉的语言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须知，这个过程并不是拿起笔做功课而已，而是通过大脑来完成的。大脑才是完成转译的地方。几十年前，语言属于“高级神经活动”范畴，远远超出人类知识和可探索的范围。大家最多能想到的不过是：研究语言的学问叫语言学，做翻译是运用语言，那研究翻译就是应用语言学的范畴。直至今日，应用语言学方面的会仍然会包括

翻译。James Holmes 那篇开天辟地之作，《论译学之名实》，便是1972年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翻译组上的报告。<sup>1</sup> 这篇文章被誉为“翻译学”的立命之作，也被视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始。狭义上，是从传统的比较文学“独立”出来。广义上，是从一种各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符号学、玄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参杂的混混沌沌的纠结状态“独立”出来。Holmes 呼吁，要建立翻译学自己的理论系统，指导对翻译在理论层面的探索以及在实践方面的运用。当然，许多人对此质疑。认为，翻译活动企及人类活动的几乎全部，语言、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宗教、族群冲突、文学、哲学、媒体、经济、金融，等等；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无不受着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请问如何可以让翻译独立？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大千世界透过语言作媒体的折射与辐射，便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之前呼吁的反思。另外，认为将翻译与语言学挂钩，是末路一条，行不通，走不阔，因为语言学关心的是语言系统，而翻译是语言运用。翻译是语言运用没错，可没有语言系统，哪来的语言运用？

其实，本来简单的问题，不必弄得太复杂。首先，翻译必须完成从源语转换至译语这一道程序，非此不可。那你能说翻译跟语言没有关系吗？其次，不管译者受谁赞助，意图与初衷如何（做翻译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民主科学，还是为了传播福音，还是为了欣赏文学），意识形态倾向如何，宗教信仰如何，源语至译语的转换必须经过大脑，别无他途，是译者的脑力劳动，或者说是大脑的认知活动。你能说翻译跟大脑没有关系吗？再次，所谓“独立”，纯粹是学术问题。如果认为前两条没错，是产生译文（或口语传译）的基础与前提，那你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调查和考虑形形色色的译文（或传译的录音）。不同的角度代表了不同的学科，岂非不就

---

1 Holmes, James. S. (1972).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Translation Studies Section,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自然而然地独立了吗？不过，此“独立”不是彼独立。Holmes 呼吁的独立，如前所说，是要建立关乎翻译过程、翻译作品、以及翻译作品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理论系统，有纯理论的原则，也有运用方面的指引。然而，这样的独立学科办得到吗？

答案现时为时过早，但要达此目的，有两条必须做到：

一、要研究翻译的认知过程。已知翻译作品必定是源语转换至译语的结果，而非前提。作品既是探索把它产生出来的那个翻译过程的事物，也是探索把它拿去使用时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文化功能效应的东西。研究翻译作品的文学、社会、文化、宗教、政治等功能已经进行了几千年。似乎还没有能告诉我们，去除了所有这些因素之后，那个关乎翻译本身的、有普遍意义的“核心”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不管谁做翻译，其身份如何，不管是为了谁而翻译，为了何种目的去翻译，处于何种历史社会环境等等，也不管是从何种语言译至何种语言，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译文（或传译的录音）反映出来共同点是什么？有什么普遍性质与特征？要回答这些问题，只能回到翻译过程，而这个领域恰恰是人类几千年来都没有触及到的。但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方具备建立独立的翻译学科的核心和基础。翻译是双语处理过程，发生在大脑里边，无人看得见。翻译学者没有做什么研究，不关他们的事，因为整个科学界都还不太懂大脑的细微结构和运作的方式。翻译时，大脑如何运作，研究才刚刚开始。理论上，翻译学者的直觉已经很不错了。譬如，James Holmes (1978) 认为，在大脑里边，在理解原文和产生译文之间（严格地说，是源语译码和译语编码之间），就是“翻译”之所在。<sup>2</sup> 这种直觉跟今天科学告诉我们的大脑如何进行言语处理的过程大致相符。感官（如眼、耳）接收到的言语信号（字符或语音）通过译码之后，其中的信息再通过另一种言语信号传递出去。因为种

2 Holmes, J. (1978/1988) Describing literary translations: Models and methods. In James S. Holmes (1988) *Translated!—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82-92. Amsterdam: Rodopi.



种原因（语言系统的转换、语境、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的不同），接收到“信息”跟再传递的“信息”之间必然有一个“整合”过程，这就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平常大家理解的翻译，是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斟酌词句，实质是“信息整合”如何用译语去表达出来。欠点科学性，但大致不错。须知，一个似乎大家都忽略了的事实是，如果要研究一部翻译作品，可以切入的角度很多，比如文学、历史、哲学、符号学、玄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等。可一旦要考察大脑中的翻译认知过程，切入的角度立刻变窄。任何译者（机器除外），大脑的生物生理结构是完全一样的。左脑处理词、句的理解和生成，右脑处理跟真实世界的知识有关的理解和生成（包括真实时间地点人物构成的语境、语境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相关知识结构等等）。这不过是最简化地来叙述大脑言语处理的过程。大脑主导语言处理，单语、双语都不例外。翻译为双语处理之典范，过程受此制约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当然，最自然不过的事常常也是最易为人忽略之事。今天，大脑科学进展神速，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随之兴起，是为欣逢其时。双语处理的特质反映在翻译过程之中，翻译作品势必有其普遍特征，不受孰为译者、孰为源语译语的限制。Katherine Reiss（1971）认为，翻译过程直接影响译文的质量，因此，离开过程去讨论质量，是无米之炊。<sup>3</sup> Mona Baker（1993, 1996）等提出要研究译文彰显的普遍特征，也很有前瞻性。<sup>4</sup> 我们的理解是，所谓“译文的普遍特征”是不以译者和语言而转移的，是大脑对双语处理的认知限制。

3 Reiss, K. (1971/2000) *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trans. Erroll F. Rhodes. Manchester, New York: St. Jerome Publishing and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2000.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71.

4 Baker, Mona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na Baker et al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 233-25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aker, Mona (1996).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In H. L. Somers (Ed.) *Terminology, LSP and Translation*. 175-18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二、要采纳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过去，对于翻译行为、作品和过程，译者谈心得、读者谈理解、比较文学讲创作时间空间的对照，都是基于对个别行为、作品或过程的体会或思考，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性质的总结与发掘。大家知道，翻译（尤其是传译）是一种职业，译者联盟协会之类，各国皆有。在欧洲，那些呼吁建立翻译学的人，自己是译者，同时又是理论家和研究者，知道如果不采纳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翻译学在学界便无从生根。到了亚洲，情况有所不同。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学的翻译系建立之初，主要是培养译者，研究是次要的。一方面老师就是译者，另一方面大学的决策者们也完全没有“何谓翻译研究、如何进行翻译研究”的意识。直到大学强势地要求所有的教员都须定期出研究成果，这个转变才慢慢开始。经过二十年，今天，大学教翻译的人，都知道要做研究。

所谓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原则上就是三点：系统地采样、系统地观察与分析采到的样本、系统地对分析结果进行解释。成熟的经验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各类工程学，在上述三个阶段都有成套的理论和方法程序。研究对象跟人有关的心理学和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程序也相当完备，尤其是实验心理学。另外，过去三十年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一项硕果，就是高科技产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及，使研究者们受惠，比如大容量、高效能的计算器、各种便利研究的软件（比如统计程序、键盘输入记录程序等等）、眼动仪（eye-tracker）、脑电波仪（EEG）、脑磁波仪（MEG）、正电子仪（PET）、磁共振仪（MRI）等等。这些以前以为只有科技研究者才用的工具，翻译研究者也照样用（Shreve & Angelone, 2010）。<sup>5</sup> 须知，翻译（尤其是传译）时不同语言的一进一出，完全是人的大脑和认知能力的应用，非用这些工具而不逮。

5 Shreve, G. M. & Angelone, E. (Eds.) (2010).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人文学者应用实验工具解决自己的问题（再如用fMRI调查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的大脑成像；Philips等，2013），科技学者应用实验工具解决跟人文有关的问题（譬如自然语言处理），二者之间交叉融合，似乎是学科发展的方向、时代前进的象征。<sup>6</sup>

当然，翻译研究者如果没有自己的实验设备，大可作为的地方就是建立语料库。语料库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口译录音及其文字的转写。不过要注意，传统的语料库技术是从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那里传承下来的。初衷是采集大量的自然语言语料，从中找到语法规则和语言应用的规则，尤其是语素和词组的规则。理论上，它是特意要与由理论导向的语言研究相对抗（譬如不相信存在普遍语法规则、认为语言系统是各种特定构式的集合）。技术上，计算器搜索形态、语素、长度有限的词组，基本上做得到，而要搜索句式和比句大的语言单位，就有困难，必须要进行人工标注。而研究者要亲力亲为去做标注，正是利用语料库来研究翻译不可避免的一关，因为我们要从文本（原文和译文）中去看的東西，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语素和词，而是以文本句（textual sentence）为单位的“话语小段”（mini-discourse units, MDU）。误判了这一点，就根本没有理解应用语料库来进行翻译研究的精髓。至于要建什么样的库，是跟研究目的相关的。

拿跟翻译过程有关的研究为例。因为翻译（和传译）是不同语言的一进一出，是经过大脑的认知过程，要抓住这个过程，首先预设：此过程的运作会留在译本或口译录音之中；或者说，译本和录音中可以找到不同语言一进一出的认知特征。但笔译和传译不同，前者基本不受时间的限制，我们不知道译者花了多少时间把译本生产出来，而后者（尤其是同声传译）非守时而不可。因此，文本库必须是“一对多”，即一个原文对应两个或以上的译文；如此，方

6 Phillips, N., Holdsworth, S., Dougherty, R., Moretti, F., Schmeisdekamp, H. & Heller, C. (2013). Attention in Fiction Read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fMRI experiment. LA, C.A.: Wallenberg Found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能找到文本中认知特征的共性，即不管译者是谁，都会表现出来的那些特征。而且，因为是“一对多”，如果有共性，那就是跟时间因素无关的共同特征。与之相对，传译库则不必是“一对多”，因为时间因素的限制，任何传译员，在实时传译的条件下，传译过程应该大致相同，除去个人因素，留下来的，足以反映过程的共性。当然，即使是拿语料库作工具，取语料库自动生成的语料模式，如何去定量定性分析，涉及一系列的理论和程序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这就把我们带回戈玲玲君的大作：基于语料库的幽默文本翻译研究——以钱钟书汉语小说《围城》的英译为个案研究。此研究将原文中有涉幽默的“话语小段”找出来，对照相应的英译本，制作成双语平行语料库，看看翻译的模式有何规律可循。理论解释的框架是破天荒第一次将“言语幽默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是为难能可贵之处。整个研究有其系统性，可供后人参考。前面说，利用语料库为工具进行翻译研究，势必要做人工标注，指在整个文本库中进行。另一个方法就是将文本中跟研究目的有关的“话语小段”一一找出来，跟相关译本制作成双语平行语料库。一般不主张这样做，除非有特殊原因。而对幽默话语进行描写与分析，正是一个特别的因素。从原文中找出700多个“幽默话语小段”，进行定性筛选分析，最终得到相关的翻译模式，再进行理论解释，就是这个研究的主线了。究竟如何，读者自己去看。

上面说的，仅仅是技术。而做学问、做研究，“术”仅为表层，深层的则是“道”。要悟道，必先攻其术，是大家都懂的一个浅显道理。老师不把“术”讲清楚，或者讲不清楚，是师之过。老师讲清楚了，学生的“术”掌握不好，则不关老师的事。就算“术”学精了，能否悟道，是各人的造化，不能勉强。戈玲玲君的“术”与“道”，有书为证；作为老师，其心也慰。须知，大多数翻译研究者，都是学外文出身，讲究传授语言技能，初时并无多少

研究者的训练。当初，戈玲玲君以教授之名分，来向我求学，我还是一个副教授。她说，从此不计名利投身学术研究。之后她做到了，不辞劳苦外出开会与国外学者交流自己的研究，有价值的研究论文时有发表。

她在中大时，翻译系地处山顶的新亚书院人文馆，山下是蔚蓝色的吐露港，山上树林掩映着圣明先师孔子的塑像。新亚是钱穆先生创办的，在餐厅吃饭，宾四先生的语录时时供众学人作壁上观：做学问的最高目的在于做人。我们常谈起这句话。她是一个宽容和热心的人，同门都愿意找她谈心，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毕业之后虽然各奔东西，也还有书信往来，可见友谊尚存。现在，她的书出版，我揣测大家都会为她高兴。是为序。

何元建

2014年11月

于横琴

## 前 言

幽默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言语交际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研究者们对幽默的研究涵盖了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神学、文化学等不同的领域。幽默被认为是最难研究的课题之一，就翻译而言，幽默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至今对言语幽默的文本语言特征、对言语幽默的译文的文本语言特征、对涉及言语幽默的翻译过程知之不多。在言语幽默的翻译中，有时候原文的幽默信息在译文中完全保留，有时候则不能，原因何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不多见；以汉语幽默文本的英译为语料建立单向平行语料库，探讨汉语言语幽默英译的一般及特殊规律的研究，尚无人做过，这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本研究以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及其英译本为语料，运用言语幽默概论的理论框架，建立原文和译文对照的双语单向平行语料库，采用语料库检索的方法，对语料进行描写与分析，得出了“译文要传递原文幽默信息需要保留或转换原文的表层及深层参数特征，特别是深层参数的脚本对立、表层参数的修辞手段及语言中的本源概念”的研究结论。

主要研究结果有三：一是展示了言语幽默翻译的一般规律，即“译文需要保留原文中的脚本对立”；二是展现了汉语言语幽默翻译的特殊规律，即“要保留原文中的脚本对立，就需要转换汉语所特有的修辞手段和汉语本源概念”；三是显示了汉语言语幽默的文本语言特征，即，汉语言语幽默具有表层和深层的参数特征。表层参数的核心是修辞手段，深层参数的核心是脚本对立；表层参数具

有“相似性之奇特统一”、“语言要素之巧妙转移”和“不和谐逻辑间之和谐”三大特征；深层参数具有“真实的与非真实的语境对立”、“正常的与非正常的语境对立”、“合理与不合理的语境对立”三大特征，反映了现实与经验、话语现实与语言经验、话语逻辑与正常逻辑的矛盾冲突。

本研究在汉语幽默文本翻译方面做了积极的尝试，旨在抛砖引玉。但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理论和文本的局限，这些也是后续研究需要克服的困难和解决的问题。

本书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稍微做了修改，书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由我本人负责。诚恳地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批评。

特别要感谢我的老师何元建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序。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南华大学人文社科”的大力支持，获得了南华大学“语料库翻译学重点社科基地项目”以及“外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项目”的资助，特此致谢。

2014年4月22日

于南华大学

# 目 录

<b>第一章 导论</b>	<b>1</b>
1.1 研究目的	2
1.2 原文及作者简介	6
1.3 《围城》研究	8
1.4 《围城》的外文译本	11
1.5 对《围城》及其英译本的研究	12
1.6 本书的框架结构	15
<hr/>	
<b>第二章 幽默评述及研究</b>	<b>17</b>
2.1 词典中对幽默的定义	17
2.2 前人对幽默的评述与研究	21
2.2.1 西方的评述与研究	22
2.2.2 中国的评述与研究	24
2.2.2.1 林语堂、钱钟书论幽默	25
2.2.2.2 其他评述与研究	26
2.3 言语幽默的可译性	29
2.4 小结	33
<hr/>	
<b>第三章 理论框架</b>	<b>34</b>
3.1 语义脚本理论	34
3.2 言语幽默概论	37
3.2.1 六个参数	39



3.2.1.1 四个必要参数	39
3.2.1.2 两个可选参数	44
3.2.2 六个参数的层级排列：言语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	48
3.3 言语幽默概论运用于幽默翻译研究：Attardo (2002)	52
3.4 理论框架的延伸	54
3.4.1 汉语特有的修辞手段	55
3.4.2 言语幽默语段的表层参数和深层参数	56
3.4.2.1 表层参数	58
3.4.2.2 深层参数	62
3.5 小结	64

---

<b>第四章 《围城》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介绍</b>	<b>66</b>
4.1 抽样过程	67
4.1.1 《围城》及其英译本读者问卷调查	67
4.1.2 理论参数	68
4.2 建立语料库	69
4.3 标注汉英对应文本	70
4.3.1 技术性标注	70
4.3.2 理论参数标注	71
4.3.3 本源概念及其翻译策略的标注	72
4.4 检索汉英对应文本	74
4.4.1 检索编程	74
4.4.2 检索功能	76
4.5 标注的误差测定	84
4.6 小结	86

---

<b>第五章 原文中言语幽默语段的分析</b>	<b>87</b>
5.1 原文幽默语段的表层特征	87